

土地流转应警惕贫富差距扩大风险

我国当前承包耕地 1277 亿亩，集体建设用地 25 亿亩，共 15 亿亩农用地。有测算，这 15 亿亩土地可以刺激中国经济百万亿元资金，而建设用地市场更大。

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到 2010 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2488 万公顷，其中城镇工矿建设用地 848 万公顷。据专家介绍，城乡建设用地可分为城镇工矿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两类。由此可估算出，2010 年我国农村建设用地规模约为 1640 万公顷，即 246 亿亩。

打破二元结构，带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2012 年国土部公布的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和合同成交价款分别为 3228 万公顷和 269 万亿元，每亩的价格约为 56 万元。据此测算，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后，246 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价格或高达 130 多万亿元。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规划部主任文辉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以上背景，此次土改意在体现农民的财产权益，并通过制度创新促成农村土地的流转，真正让农民的财产权得以“显化”。

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在二元制结构下，我国农村集体用地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而建设用地又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其中，农村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指宅基地。

多地加速试点释放红利

日前，国土资源部批复同意《广东省深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示范省工作方案》，东莞作为四个试点城市之一，东莞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实施《关于建立健全常态化机制加快推进“三旧”改造的意见》称，东莞的“三旧”改造政策延续并将长期化，并且要加快存量土地二次开发。

“三旧”指的是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三旧”用地多为集体建设用地。因此，“三旧”改造是从另一角度进行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东莞“三旧”改造方案显示，若选择出让土地，企业、村集体除取得原有补偿外，可以分享 30%-60% 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原已征收的土地改变用途，如由工业改变为商住，补缴的出让金原村集体可分成 40%。

对于集体选择不进行土地出让的，方案

指出，允许原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企业自行改造和市场主体收购连片地块集中改造，并收取较低的定额土地出让金。

数据显示，2010 年至今，东莞市“三旧”改造共产生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费 67.80 亿元，市政府返还给镇、村两级 65.34 亿元，占 96.4%，其中镇 60.65 亿元、村 4.69 亿元。

与此同时，就在三中全会闭幕前一天，厦门首例农村宅基地进行拍卖。资料显示，参与这宗拍卖的土地是集美区灌口镇灌口村三组住宅，土地使用类型为集体土地使用权。拍卖标的总建筑面积 1216.5 平方米，起拍价为 4707.8 万元。根据拍卖公告，该标的同时具备《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两证。

而值得注意的是，虽属宅基地，但其吸引力却不可小觑，以至拍卖现场达到火爆的程度。先后有 10 多位竞买人，经过半小时的激烈争夺，最终落槌价为 680 万元，溢价达 44%。

有业内人士称，如果拍卖等到三中全会闭幕后进行，强烈的土地改革信号或将带来更高溢价。

随着三中全会土改信号的释放，农村土地改革正在提速。全会闭幕次日，安徽便宣布在 20 个县区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指出 2015 年底前实现农村集体所有的国有土地确权登记证发证全覆盖。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发展土地流转信托，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此外，深圳凤凰农地也再次打破了原有分成模式进行入市。

贫富差距有扩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此前指出，应警惕因土地价值不同而造成的新的不平衡。

“大城市周边的农民通过城市化的改造获得了很多补偿，可以享受到此次土改的绝对红利，但偏远地区的农民可能根本一点都享受不到。”刘永好表示，东西部地域差别、城市差别、距离城市远近差别将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剪刀差，最终只能是城边的极富，远处的越来越穷。就像新疆的房价不能和北京比一样，就连北京边上的河北也不能与北京相提并论。深山中的农民更是如此，这样下来，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万科副总裁毛大庆也认为，城乡一体化，改变二元结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农村的土地跟城市的土地还没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是因为城市的土地没有给城市人带来什么资产的变化，或者财富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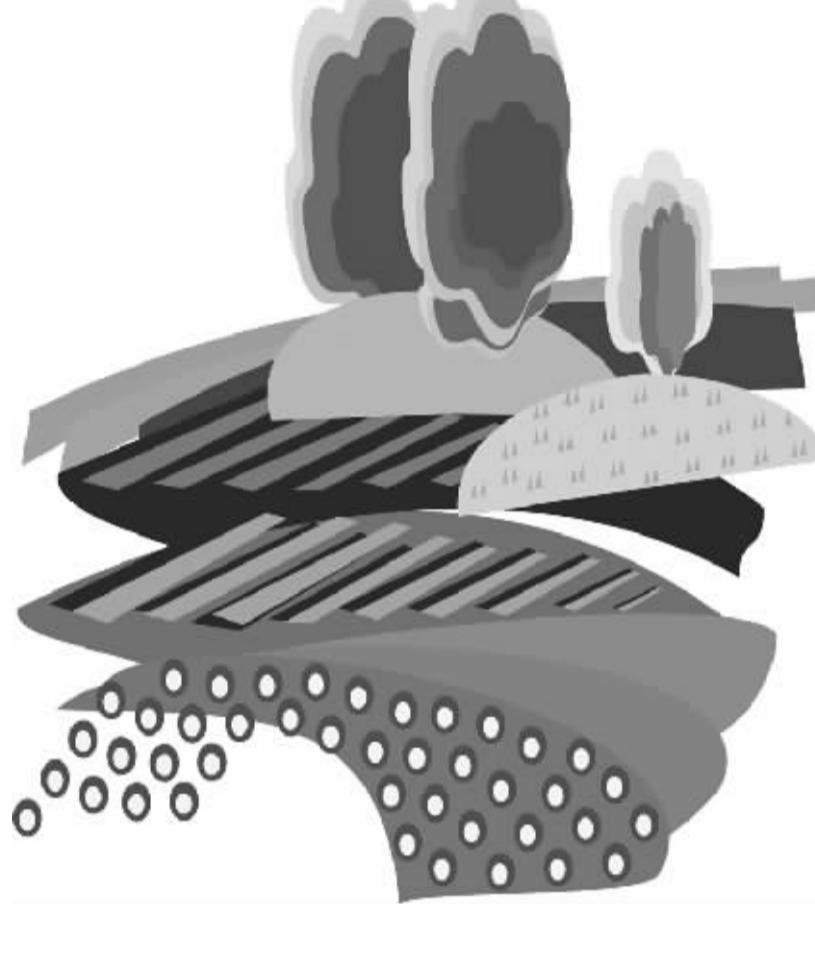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 15、20 年，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城市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形成了资源和财富的互动，使得拥有城市户口和城市资产成为个人和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通道。于是城乡二元问题出现了。”毛大庆认为，城市土地后面挂着一大堆资源，包括医疗、养老、咨询、文化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城乡矛盾，不是仅仅解决土地问题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此外，毛大庆同时指出，不是农村的土地都能变为财富。“其实大量的都变不了，有个城市吸引力调查，结果是全国只有 40 到 50 个城市对人的移动有吸引力。换言之，有吸引力的城市才四五十个，农村哪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地变成财富，谁会要他的地？他流转给谁？”

中央已注意到此类风险。陈章良透露，中央层面要求对如何避免在城市出现贫民窟进行调研。在没有足够的财富时，虽然土地流转出去，但进了城的农民仍难以在城里生活。可能刚生活几个月，就没有钱了。因此，变得又想回农村了，可那时他已经没有地了。

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表示，农村土地入市增值收益不能都给失地农民，必须要覆盖政府、土地开发商、大部分市民、失地农民、远离城市农民五个群体的利益才可以确保农村土地流转的公平。要避免土地流转成为少数人的“盛宴”。

(来源：新浪网)



农民工转城社保等于白缴 3800 万人弃缴属无奈

正当社会各界正在为如何调整退休制度以确保其能正常运转时，另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浮出水面：弃缴社保。据报道，全国今年累计有 3800 万人中断缴保险；人社部不久前的一项调查则发现，有 23% 的工作人口中断了社保缴费。社会保险要能有效地运作，前提是所有人都参与供款，如果一部分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因为各种原因弃缴社保，那么整个社会保险制度可能将陷入入不敷支的困境。

养老保险只要参保满 15 年便可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因此，如果以是否缴够 15 年来看，弃缴社保群体分两种：一种是已缴够 15

年后不再缴费，等着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群体；另一种则是未缴够 15 年却因为各种原因中断缴费的群体。显然，在弃缴社保讨论中，关注应放在后一类群体中。该类群体可按中断缴费是否属个人意愿分两类，第一类是被动中断（例如老板不给交了），第二类则是劳动者自己要求不交。

根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雇主有责任给劳动者签劳动合同并依法购买社会保险。中断为劳动者购买社保是违法行为，如果政策没严格执行理应问责执法机构。然而，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便是当劳动者到达退休年龄却仍继续在原岗位上工作时，雇主可以

只发工资不买养老保险。这种情况对女性工人（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岁）尤其常见。例如很多农村妇女都是在三十几甚至四十岁时才进城打工，相当多人在 50 岁前不可能缴够 15 年。当然，这个群体也可以自己掏钱来买够 15 年，但这意味着不但要交个人账户的 8%，还要为社会统筹的 20% 基础。如果月薪不过 2000 元，这样就得划掉五百多，委实让人两难：若眼下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如何筹划未来？怎样为这类被动中断缴费的群体设计一个合适的缴费机制，不啻是社保改革的当务之急。

主动或者自愿弃缴社保的群体，相信大

部分是流动性大的农民工，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福利可携：社保关系在不同省份乃至城市间的不可转移。农民工群体在 A 城市做几年然后转去 B 城市，是很常见的事。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民工最后只能拿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结余，社会统筹部分将全部留给原城市，等于白做贡献。说句题外话，这也是某些外来人口比例高的沿海城市社保结余奇高，能给本地户籍群体发高额退休金的原因。社会保险刚刚推行之时，很多农民工还没意识到有可能白给统筹账户作贡献的问题，现在他们清楚了，所以会有一部分人干脆要求老板不交社保，直接把本来要缴社保的费用

全部打包到工资里一起发。这当然于法不合，但站在农民工的角度看，如果社保关系继续不可转移，只能提个人账户结余不能转账统筹账户，何异于合法地“劫掠”他们的养老金？

2010 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提出，在五大险种中，养老保险长远要做到全国统筹，其余四险则起码要省级统筹。然而，这个长远目标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过去三年莫说全国统筹，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也进展缓慢。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弃缴社保，显然是在用脚投票，这无疑是一个警醒。有关各方必须以强有力的方式落实福利可携。

(来源：腾讯网)

4G 未发怪移动“抢跑”？

不过，仍有部分网友在追问：4G 牌照是不是有些“难产”？

一位电信专家此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过去一直没发是因为要“保持市场相对平衡”。因为，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都主张 4G 发展，且早在年初就有发牌的想法，“但当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还在准备中，如果直接发牌照，中国移动的优势会更强大，一旦发放牌照可能会导致三家运营商实力的不均衡，所以一直对牌照留而不发”。

但现在，发牌的时间应该已没问题。”上述专家认为，中国移动早就搭好了基础设施，中国电信和联通至少也做了一些准备。

对此，项立刚告诉记者，比较靠谱的时间点还是在 12 月 18 日。但他强调，“这是我个人得到的版本，具体还得向有关部门求证。”

值得注意的是，12 月 18 日恰恰是 4G 时代的“领跑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正式推出 4G 商用业务及可能发布中移动版 iPhone 的时间点。

运营商都有机会

事实上，中国移动一直是 4G 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在 3G 时代，中国移动丢失了不少高端用户，增长陷入“瓶颈期”，其亟需 4G 以寻找市场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在还未到来的 4G 时代，中国移动就开始建设自己的 4G 基站，并高调宣布自己的 4G 产品。

此前，中国移动表示，“工信部正式批复同意中国移动在北京等全国 326 个城市开展 TD-LTE 扩大规模试验，本期工程共将建设基站 206 万个，将在 100 个重点城市实现主城区的连续覆盖和一般城区的数据业务热点区域覆盖。”

在消费领域，中国移动也有所布局。11 月 6 日当天，北京美惠、西直门、金融街等 10 家移动营业厅将接受 4G 手机的预订。

但中国电信不甘人后。有消息称，中国电信近期也在进行内部 4G 测试，并在积极制定相关标准，参与厂商多达几十家。而对于大力支持 FDD-LTE 的中国联通来说，TD-LTE 牌照的发放并不能完全形成利好，且 FDD-LTE 短期内并不能获得工信部的发放许可。

“在 TD-LTE 牌照发送后，领先的肯定是中国移动。”不过，项立刚认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有市场机会，“未来可能的格局是，在大城市，电信和联通会采用 TD-LTE 和 FDD-LTE 并举的形式，以与中国移动分庭抗礼。在中小城市，电信和联通肯定会发展 FDD-LTE，争取中小市场的份额，形成新的利润点。”

市场迎来机遇

市场普遍认为，即将来临的 4G 时代绝不是三大运营商的“三国杀”，在 4G 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均会有很大的市场机遇，甚至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据媒体报道，工信部和中科院等权威部

黄烨 / 文

过去一直没发是因为要保持市场相对平衡，当时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还在准备中，如果直接发牌照，中国移动的优势会更强大，一旦发放牌照可能会导致三家运营商实力的不均衡，所以一直对牌照留而不发。

11 月 28 日晚间，4G 概念股之一的硕贝德发布异动公告称，“4G 网络布局与建设尚需要一段时间，故国内 4G 天线产品为公司业绩带来较大增长尚需时日，短期内国内 4G 天线不会对公司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硕贝德称，现阶段公司 4G 天线主要用于出口海外市场的移动终端产品上，目前市场份额还不大，短期内也不会给公司业绩带来重大影响，“随着国内 4G 网络的普及，4G 天线对公司营业收入的贡献预计会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显现出来”。

硕贝德之所以发布预警公告，是因为 11 月 26 日、11 月 27 日、11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从种种信息看，让硕贝德股价产生异动的原因是一则市场传闻——11 月 27 日，有媒体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中国 4G 牌照将于 11 月 28 日公布。但截至《国际金融报》发稿，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没有公布与 4G 牌照发放时间有关的任何信息。本报也无法及时联系上工信部。

部门和机构曾预测，“4G 网络前期建设拉动的投资规模在 5000 亿元左右，网络正式商用后，还将带动终端制造和软件等上下游行业，产业规模将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

项立刚此前对记者表示，4G 主要是对终端和资费两方面产生影响。他分析，一方面，终端可能实现换机潮。尽管 4G 还没正式铺开，华为、中兴、爱立信等已接到了很多订单，“终端的价格会小幅提升后逐渐下行，且同样的配置下，4G 手机的总体价格会低于 3G 手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持续降低”。

事实上，中国移动 CEO 李跃在泰国出席电信展会的表态也值得市场关注：中国移动将大力推动 TD-LTE 终端成本的下降，“希望在今年年底有 150 美元的 4G 手机面市，并预计在明年下半年有望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中国移动想将 4G 全面覆盖各阶层市场。

项立刚还对本报称，4G 的推进可能会使得流量资费会越来越低，“就如过去 3G 网络推出之后，居高不下的 2G 流量资费就下降了不少”。

不止如此。一家互联网视频网站负责人 10 月底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3G 时代已经给互联网视频行业带来了机会。4G 时代的机会，更加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4G 产业的成熟也带来了“走出去”的机会。有报道称，“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李克强日前与罗方达成协议，两国将在 4G 方面加强合作，罗马尼亚有望在中国帮助下提前进入 4G 时代”。